

姚江文化丛书



姚江田野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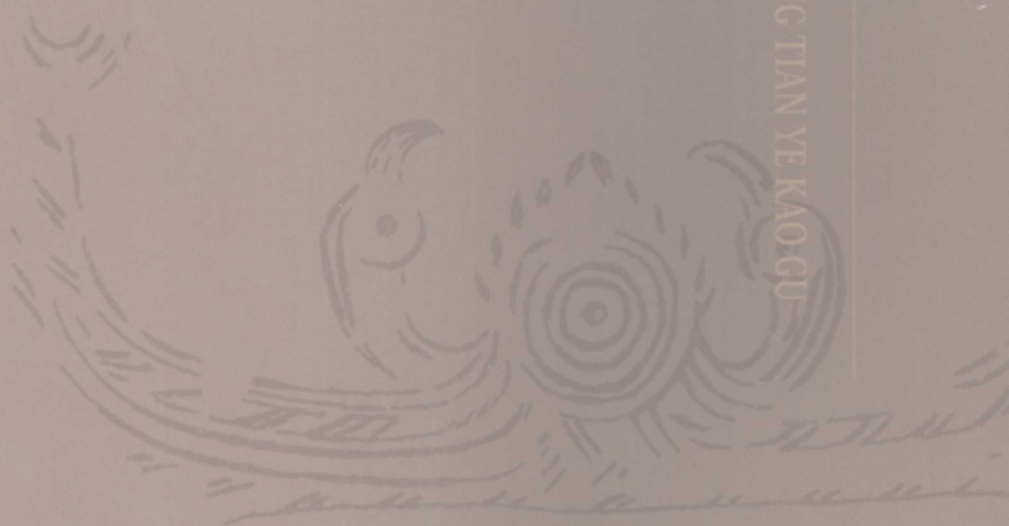
YAO JIANG TIAN YE KAO GU

浙江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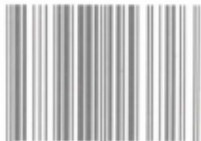
封面国画：陆一飞
封面装帧：计文渊 刘欣

姚江田野考古

YAO JIANG TIAN YE KAO GU



ISBN 978-7-80715-372-6



9 787807 153726 >

定价：98元（RMB）

《姚江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 王永康
副主任 陈伟俊 吴 展
成 员 熊培军 周建华 王 标 诸伯钧
李臻颖 张建华 叶树望 魏振纲
章亦平 杨 颖
秘书长 周建华 (兼)

《姚江田野考古》编委会

主 编 叶树望
编 委 姚晓强 孙栋苗
 谢向杰 黄渭金

总序（一）

余秋雨

如果借用中医的经络学说，那么不妨说，中华文化经络的主干，由大河组成。姚江文化则是整个文化经络中一个很关键的穴位。但是这个问题关涉到广远的背景，请允许我在这篇序里稍稍讲开一点。

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河川文化。从地理意义上，北部的草原、西部的高山都是中华文化的屏障和边极，对中华文化的直接影响不大；东部和南部的大海对中华文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存在，一直没有建立亲和关系。因此，中华文化的中心不是游牧文化、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而是以河川为命脉的农耕文化。河川灌溉了农业文明，又会不断地破坏农业文明，所以治水成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使命，“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作为一种“原型”永久承传，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做治水的大文章。

中国有四条大江，北端的黑龙江、南端的珠江，遥相呼应，拢括了绝大部分国土；而中间部位则是两大世界级的河川：黄河和长江。其中，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

中国的早期文明分布很广，但最集中的是黄河流域。不仅远古时代的三大帝王尧、舜、禹都建都在现今山西、河南的黄河边上，而且后来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咸阳、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商丘等都城，也都紧贴着黄河。

河川哺育了经济和政治，必然也会进而哺育文化。中国先秦诸子中的大部分哲学家、思想家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等都产生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和山西，因此他们所奠定的中国思想的经典模式，也可以说是黄河岸边的思考成果。当然，大智者产生于环境又超越环境，黄河岸边的思考的影响遍及九州大地，与此相应，黄河流域的艺术文化也达到了极高水平，即便是今天的旅游者也能从一座座雄伟

的古代建筑和一处处雕塑、绘画、石窟中领略当年黄河文明的气势。

但是，中华文明的中心终于从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转移了。转移的直接原因开始与文化无关，但后来却显现出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原因。

转移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黄河的自然灾害，黄河流经北方的黄土高原，每年要挟带十六亿吨黄沙泥土下来，致使下游淤塞决堤，在近两千年中，决堤泛滥已达一千五百多次，平均每四年有三次。这种频繁的危害使黄河流域越来越难成为人民生养安息之地，更不可能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了。

转移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邦国密集、政局更迭，使黄河流域成了征战的热土。每次战乱必然会带来大量民众、士人的南逃，南方本来还属荒蛮之地，却因南逃人群的开发而日益繁荣起来。尤其是公元四世纪初期的“永嘉之乱”，大量北方士庶避难南逃，直到很多年之后诗人李白仍然经常目睹南逃景象，而一见这种景象就联想起永嘉年间，他有诗写道“三川北虜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转移的第三个直接原因是逃奔的目的地长江流域平安富饶，足可安居。长江也有洪灾，但近两千年间决堤泛滥约二百多次，平均每十年一次，只占黄河水灾的百分之十四，再加上长江流域气候温润，雨水调和，土地肥沃，经济中心的转移有很充分的条件。

因此一般说来，晋代以前，黄河流域强过长江流域很多；由晋至唐，两河对峙；而宋以后，重心已在长江流域，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在世界历史上，许多次文明重心的转移常常伴随着严重的对抗，但奇怪的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没有发生这样的对抗，两河文明很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了，这使中华文明避免了一次致命的内部冲突，奇迹般地延续了生命。造成这种良好结果的原因是：

第一，长江文明早有悠远的准备和积累，底蕴深厚，高度发育，因此黄河文明在向长江文明转移的时候，并没有在文明浓度上减弱。源远流长的长江在黄河文化显赫之时，早就默默地濡养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不仅拥有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庄子、墨子，而且还拥有不同凡响的屈原和其他为数不少的文化大师，这使得纷纷南逃的士庶百姓不是走向荒昧，而是加入了一种新的文明；

第二，当长江文明悄然崛起的时候，黄河文明的核心精神尤其是儒家精神以

其固有的宽厚和大气与长江文明建立了友好关系，重心转移变成了一种优势互补。在风格上，黄河文明雄浑、豪迈、粗犷；长江文明瑰丽、清朗、精雅，都与两河的自然风貌有关，又足以互相补益。当然，这除了两河的阔大气象外，还与两河文明同属农耕文明有关；

第三，一些以长江为生命的文学巨匠，以自己的万里行迹、开阔胸怀和精美作品，把长江文明推上了举世瞻仰的高峰地位，使文化即便不仗经济之势也能巍然自立于历史。其中最突出的，有继屈原之后漫游于长江之畔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他们流连江滨，沉醉长江、描写长江，使长江成了一条文化上的大川，足以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第四，与我们这部《姚江文化丛书》有关，从明代开始，长江下游的姚江地区，开始成为中国人文思维的一个重镇，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这种情况，使长江下游当之无愧而又平静厚实地取得了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总结权。此时此刻，小小的姚江所涌流的智慧，甚至已经不亚于滔滔黄河了。

任何突起的亮光总有远期的火种，姚江文化在明清两代的突然辉煌不能不让全国学人回过头去追溯地域性的历史原因。这种追溯为长江文明的履历增加了证据，特别是河姆渡文明的发现，更让人们把深长的思绪投向远古。也许，前面所说的重心转移其实只是皮相之见，把政治的集中、记述的丰富、表层的热闹当作了判定文化重心的标准？也许，重心这一概念的设定就是“大一统”观念的产物，中华文化其实一直处于多重心、也即多穴位的状态？但是，在尚未获得更多切切实实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前，我还无法放弃上述的宏观经络图谱。姚江文化，既是这一图谱的产物，又有可能改动这个图谱，这样的研究，太有诱惑力了。

历史终于推进到现代，姚江文化的魅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余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日新月异，人们愈加产生了重新认识和发扬姚江文化的责任感。眼前这套《姚江文化丛书》，是在余姚市政府的主持下各相关单位合力编写的成果。格局完整、资料齐备，充分体现了当代余姚人对姚江文化的一种自觉体认。历代余姚人总是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文化自觉广受瞩目，这套丛书又提供了一个当代例证。

总序（二）

王永康

余姚以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而被誉为“文献名邦”、“东南名邑”，早已闻名遐迩。自2004年组织上调我来姚工作之后，通过对城乡各地的调查、名胜古迹的探访和与各界人士的接触，进一步加深了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了解，增添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感情。

这里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是风光旖旎的山水城市。放眼余姚，南屏巍巍四明山，北枕滔滔杭州湾，百里姚江横贯平原腹地。而作为全境中心的姚城，则是一水中流、四灵环抱、虹桥飞架、双城相拥的风水宝地。从四明幽谷中的道家洞天、唐诗之路，到杭州湾畔的四季绿原、观潮景点，处处都是引人入胜的佳境。如今，更成为一方旅游观光的绝好去处。

这里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姚江流域沃土遍野，宜于农耕与生活。1973年在姚江之滨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以大量出土文物，证明了早在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人工栽培水稻，捕鱼打猎，构建干栏居舍，形成原始村落。余姚因而被中外考古学家确定其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发祥地，同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继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之后，这里又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之说，当代著名学者史树青教授因而认定余姚为虞舜所出的“姚墟古迹”。

这里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是人文荟萃的文献名邦。余姚自秦时置县两千余年来，“江山代有才人出”。两汉之交的高士严子陵、东吴《易经》学家虞翻、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初唐书法家虞世南、南宋名臣孙子秀等，皆名垂千秋。明清两代，这里更因孕育了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阳明），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梨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朱之瑜（舜水）而蜚声海内外，以至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赞叹：“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

这里众志成城,英勇抗战,是名扬全国的革命老区。余姚人民爱国爱乡,历来有与入侵外敌、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传统。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姚北群众在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率领下奋起抵抗,终于荡平了倭寇。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开辟了以姚南梁弄为中心的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包括四明、三北、会稽、浦东四个地区,十四个县域的人民政权,名列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为余姚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这里区位优势,经济繁荣,是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余姚地处浙东宁绍平原中心,东接宁波市区,西临绍兴、杭州,物华天宝,经济发达。沪杭甬铁路、杭甬高速公路和杭甬运河横贯境内,空运、海运近在咫尺,交通十分便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余姚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综合实力连年排在全国百强县(市)前列。

而今,余姚这座千年古城,正以强劲的步伐,朝着经济更具实力、文化更富特色、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趋和谐、人民生活更为殷实、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和谐宜居城市目标迈进。

在沧海桑田的几千年,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余姚人民在农业、水利、工商、文艺、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创造了惊人的业绩,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和文史记载。继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全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国务院又先后确定河姆渡文化遗址、王阳明故居、黄宗羲墓和浙东区党委旧址等胜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余姚的光荣和幸运!

为了留存文史资料,记载前贤和今人的创业行迹,使之成为弘扬优秀文化、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中共余姚市委、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编辑出版这套《姚江文化丛书》。作为建设文化强市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相衔接,争取用四到五年时间,完成全书的编印任务,以期姚江千年文脉绵延不竭,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发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概 论

田野考古是一门近代才在欧洲形成的学科，在科学的田野考古诞生之前，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豪家大族们对古物收藏的热情长盛不衰。在中国，收藏古物的风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至公元10世纪的宋代，我国金石学研究颇为发达，有志者开始编纂专著出版。明清以降，分门别类的著作如雨后春笋，除继北宋以来的金石著作外，又增添了钱币、玉器、陶瓷器、碑刻等，其中尤以古文字研究为突出。这一时期，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余姚，古文字的研究和地下遗存的出土就屡见于文献记载。如在余姚坞山“有考古台，明初赵抃谦筑之，以著《声音文字通》者也”^①；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记载着“南宋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②；清初黄宗羲于《四明山志》中说，在陆埠三女山“近有于三峰下掘地得志石，乃虞世墓，当时即掩，惜未见其文乎”^③；接着他又在《孟子师说》中考证：“余姚有历山，上虞有握登山……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④清代咸丰年间，在余姚陈山下又出土了南方早期的碑刻——东汉“三老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余姚一带很早就萌发了考古思想，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地下遗存，为近代早期田野考古在这一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田野考古作为一门学科，其起点应是人们自觉地为认识人类的发生和发展去进行有目的的科学发掘。如果以这种理解为出发点，在中国，科学的田野考古要至1926年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和1928年对殷墟进行调查和发掘才算开始。地处浙东的姚江地区，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当大多数对考古感兴趣的国人还停留在纸上谈兵时，我国考古界前辈、著名的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就对余姚境内的上林湖越窑遗址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古调查，迈出了田野考古的第一步，并研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

江》。至此，余姚地区进入了科学的考古时代。

新中国诞生后，上世纪50年代，余姚历山乡黄清堰村锭子山东麓的茅湖一带，当地农民在兴修水渠时挖出了大量黑陶和夹砂灰陶片、石铤、石斧以及兽骨、木炭等。当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根据遗物散布范围推测，茅湖遗址是古代越州地区所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大的一个，并确认为良渚文化遗存^⑤。这是在我市境内首次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

1973年夏天，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以及1977年至1978年的第二次发掘，更是震惊世界。它不仅具有七千年的历史，而且考古遗存极为丰富，保存之完整性、全面性、系统性在同期的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是罕见的，其几乎全方位地保存了一个我国南方原始氏族村落的生活风貌，以一种灿烂的全新的文化面貌屹立于世人面前，被学术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有力地说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1986年，对余姚周边慈城镇西北角慈湖遗址的发掘，确认了其上、下层文化应是河姆渡文化向良渚文化发展阶段上的一种新的文化内涵，并首次在姚江地区确立了良渚文化钱塘江南岸类型地层。1994年对鲞架山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河姆渡文化二、三期之间的文化缺环，并为河姆渡文化包括河姆渡遗址第一至第四文化层这一认识的确立和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总之，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先后在姚江地区开展的史前文化遗址调查和一系列考古发掘，不仅深化和充实了河姆渡文化内涵，奠定了宁绍地区史前文化考古基础，同时也牢固确立了河姆渡四期文化承前启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序列，基本确立了良渚文化钱塘江南岸类型地层在姚江地区的存在。此外，鲞山遗址中发现的燧石质的细小石器，以及田螺山遗址淤泥层下距地表5米多深处发现的微粒木炭，均为寻找和探索姚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更早遗存提供了一定可能。

在墓葬考古方面的重要发掘有1992年明伟老虎山土墩墓与1998年低塘石屋山石室土墩墓的发掘。这两次发掘对于加深认识西周春秋时期土墩及石室土墩墓的分布规律，埋葬特点和习俗，进一步了解战国时期姚江地区墓葬形制的演变及楚、越文化的相互融合等均具许多重要的启示，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此外，1978年至1990年，湖山乡汉—南朝50余座古墓葬发掘的影响和收获也都很

大，如太康六年、建兴二年、太元三年、泰元八年等纪年墓的发掘，为两晋墓葬结构及出土器物断代分期提供了准确的标尺。木盖顶砖椁墓、券顶砖室墓及平面形制的揭露，对研究姚江地区古代墓葬的形制、墓葬习俗及其演变发展，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地处姚江地区的上林湖，历史上大多时段归属余姚管辖，它作为越窑青瓷的发源地，学界惯称“余姚窑”，有“唐宋瓷都”之美誉。其烧制规模宏大，釉色粲然，如冰类玉，世所罕见，唐时与邢窑齐名，素有“南青北白”之誉。1957年因建上林湖水库，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对上林湖窑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新发现了20余处古窑址，并发表了《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199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慈溪市文管会又一次对上林湖及其周围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仅上林湖库区窑址就达到了115处。以后又试掘了低岭头窑址，相继发掘了荷花芯、寺龙口及石马弄窑址，其出土瓷器与宋代《中兴礼书》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绍兴四年（1134年）朝廷曾分别命越州和绍兴府余姚县烧造明堂祭器的记载相吻合^⑥，从而用考古事实把越窑烧造的下限推至南宋时期，并解决了烧制宫廷用瓷的窑炉和“官窑型”瓷器的性质。

应该说，自20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走出书斋开展田野考古调查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几十年来的孜孜追求和探索，对姚江地区的地下遗存有了一定的认识，明确建立了河姆渡文化的四期发展序列，提出了河姆渡后续文化的概念，为深入探讨河姆渡文化的源头及与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关系、河姆渡文化的聚落形态开创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考古揭示面积有限，资料并不充裕，河姆渡文化的聚落重点与非重点区域、葬俗、制陶、衰弱原因等问题仍未有突破性进展，还未能较完整剖析姚江地区地下遗存的历史面貌，特别是对牟山湖窑群的考古调查、商周遗址的揭露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尚是个空白。相信经过当前正在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新一轮田野考古工作，必将为系统阐述姚江地区的地下遗存提供新的课题和材料，并将取得崭新的田野考古成果。

【注释】

① 黄宗羲：《四明山志》卷二，《黄宗羲全集》第二册33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下同。

②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二。

③ 《四明山志》卷二，《黄宗羲全集》第二册330页。

④ 黄宗羲：《孟子师说·舜生于朱冯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104页。

⑤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工作报导》(13)，1956年。

⑥ 赵子直：《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

目 录

总序 (一)	(1)
总序 (二)	(5)
概论	(1)
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	(1)
二、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	(67)
三、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	(83)
四、河姆渡文化遗址调查概况	(100)
五、浙江余姚市鲞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119)
六、余姚市鲞架山遗址发掘报告	(125)
七、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	(172)
八、浙江余姚市鲞山遗址发掘简报	(192)
九、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发掘简报	(209)
十、余姚田螺山遗址 2004 年考古发掘简报	(230)
十一、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发掘	(255)
十二、余姚市低塘石屋山古墓葬发掘简报	(298)
十三、余姚市湖山乡汉——南朝墓葬群发掘报告	(310)
十四、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	(339)
十五、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掘简报	(355)
十六、浙江慈溪市越窑石马弄窑址的发掘	(384)
后记	(404)
姚江田野考古相关专著及论著目录	(405)
彩版	(407)
图版	(455)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博物馆

前 言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四明山和慈溪南部山地之间的一条狭长的河谷平原上。萧甬铁路自西向东在平原的中部通过。遗址往西五十里是余姚县城，往东五十里是宁波市，所在地在余姚县罗江公社东方红大队河姆渡村东北。遗址西面、南面紧临姚江，过江是四明山麓；东面、北面是一片平原。根据有关地质钻探资料，在这片平原的耕土层以下有大片厚度不一的泥炭层。穿过平原是慈溪南部山地。遗址适在丘陵和平原的过渡地段，其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略呈缓坡（图一；图版一，1）。

1973年夏天，河姆渡村社员在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发现了这个遗址。随后，我们进行了调查、试掘，同年11月开始第一期发掘，翌年1月顺利结束。发掘面积810平方米，T4~T11无文化层，实际发掘面积630平方米。

发掘工作是在党委领导下，当地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加下进行的。资料整理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植物研究所、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省水文地质大队等单位的帮助，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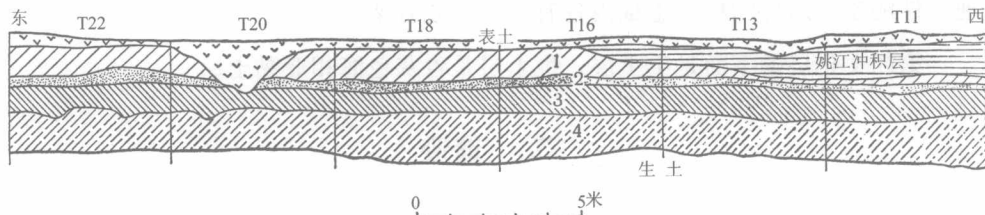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面积有限，葬地尚未发现，工作还是刚刚开始，而且杭州湾南岸的这类遗址，过去又未发现过，因此，要对河姆渡遗址的文化面貌作较全面的分析是有困难的。这里，我们仅对这次发现的材料作一介绍。

一、地层堆积

遗址有四个相叠压的文化层，除T22、23、26、27四个探方中有一条近代战壕打破文化层外，其余都保存完好。各文化层的土色、土质清晰可辨，出土遗物也明显有别。现以T14、15、16、18、20、22六个探方的南壁为例（图二），介绍如下：

表土层。灰黑土，厚10厘米~43厘米。

冲积土层。灰黄色土，深20厘米~140厘米，厚0厘米~120厘米。土质纯净，无其他包含物。从T14、15南壁剖面看，形成这层冲积土时，冲刷了遗址的第一文化层。



图二 T14、15、16、18、20、22南壁剖面图

第一文化层。黄褐色灰土，土质较硬，深80厘米~155厘米，厚10厘米~105厘米。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两类，石器有斧、镑、耜、凿等。陶质有夹砂红灰陶、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三系。器形有釜、鼎、盃、鬲、甑、罐、豆、盆、盘、钵、杯、支座和器盖等。其中扁平穿孔石耜、扁平长条形石镑，扁圆腹釜，鱼鳍形、三棱形、凿形、扁凿形足鼎，泥质灰陶豆、杯等，是该层有代表性的器物。时代相当于崧泽中层。

第二文化层。黄绿色土，土质甚硬，内有褐色斑结，二层底部夹有砂和小砾石，深120厘米~186厘米，堆积较薄，厚20厘米~35厘米，自西向东逐渐加厚。这层西部诸探方发现有零星柱洞，东部T34~T37四探方中部发现木构水井一个（井1）。还发现人骨架两具。出土遗物有石、骨、木、陶器等。陶质分夹砂灰红陶、泥质红陶、泥质黑陶三系。其中弧背长条形石镑、有孔石刀；腰沿釜、多角沿釜、锥形足鼎、盃、异形鬲、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牛鼻耳罐、折腹圈足盆等是二层典型器物。时代相当于马家浜和邱城下层。

第三文化层。砂质灰土，土质松软，深210厘米~255厘米，厚65厘米~115